

创新发展效应逐显 海南服贸快速发展

新华社海口12月6日电(记者吴茂辉、李强)三亚市中医院里的外国面孔明显变多了。“老中医”成为三亚继阳光、沙滩之后的一股“新引力”。“我不仅是来旅游的,也是来看病疗养的。”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伊伦娜·潘科娃说。

一年多以来,作为全国唯一省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海南立足自身优势和产业特色,正不断探索一条以旅游国际化为核心的创新发展之路。

“旅游+”概念统筹创新发展

和伊伦娜·潘科娃一样,到三亚市中医院特色诊疗部看病的外国顾客,首先要接受中医师的体检,辨别体质;然后再根据体质、病情,因人而定制治疗方案。

“外国顾客大多数人是看颈椎、腰椎、妇科及儿科疾病。”特色诊疗部主任唐毅说,“目前治疗手段以针灸和推拿为主,部分辅以中药。”

去年以来,海南积极推进中医药服务机制创新,允许三亚公立中医医疗机构的特需医疗服务比例限制调整到30%,从而释放少量优势资源参与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建设,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国门。全省去年服务境外居民2.3万人次,出口额531万美元,同比增长77%。

2016年2月,海南被国务院确定为15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之一,提出在旅游、运输、文化服务、保险服务、服务外包、中医药服务等6大领域8个方面的创新任务。

“我们提出‘旅游+’的概念来统筹发展,包括旅游+运输、旅游

+医疗健康、旅游+文化教育等。”海南省商务厅服务贸易促进局副局长姬国辉说,“作为国际旅游岛,实现旅游的国际化,是海南试点工作的核心思路。”

在多重政策刺激下,海南今年1月至10月,接待入境过夜游客88.77万人次,同比增长57.1%,创历史新高。

“一带一路”市场推动扩大开放

得益于海南省商务、旅游等部门的支持,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前不久成立了面向东南亚市场的包机公司,运作海口至雅加达等4条航线的包机。“试点带来了政策优惠,公司预计今年接待入境游客将突破万人。”

海南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为重点积极扩大开放。2016年,新开和恢复30多条航线,覆盖俄罗斯、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同时,通过补贴鼓励旅游企业和包机商积极新开境外航线航班,助力海南入境游发展。

如果说航线的增加为海南服务贸易拓展架起“空中桥梁”,那么中国(海南)·东盟青年创新创业园的设立则为海南服务贸易拓展搭建“网上平台”。

依托于海南生态软件园在互联网领域的行业聚集优势,创业园在游戏开发、软件定制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政府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出台措施促进离岸服务外包,2016年公司是与境外公司共计签署委托开发合同8份,实现创汇160多万美元。”海南英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项

目部副总经理柳玉龙说。

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海南积极争取放宽中外合作办学限制,新增5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其中,海南大学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合作开办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境外合作办学项目,成为海南首个境外学历教育项目,也是国内首个旅游管理类专业境外学历教育项目。

敢闯敢试不断释放改革效应

试点开展以来,海南按照中央事权和自主创新两大类,在6大领域8个方面及公共服务领域梳理提出的68项创新任务,目前已完成53项,完成率78%。在改革刺激下,2017年上半年,海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9%,高出全国11个百分点。

同时,在成绩之外也要看到,发展底子薄,服务业总体水平不高是海南面临的客观现实;加上试点时间较短,改革举措缺乏系统性思维,试点面临着全社会参与度不够、体制机制尚未取得全局性突破,政策聚焦经济效益不足等问题。

“从明年起,我们将对经济较发达的市县增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方面的考核。”姬国辉说,下一步海南将强化督查考核工作,同时对已出台的政策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引进和培育更多服务贸易市场主体,确保改革创新取得实效。

“我们将继续大胆闯、大胆试,深入梳理服务贸易体制机制和便利化方面的短板弱项,争取在关键问题上突破。”海南省商务厅厅长吕勇说。

河南濮阳:杂技让古老村庄焕发生机

新华社郑州12月4日电(记者王林园、碧念)“三次断臂,三次崛起,不能放弃的是对杂技的热爱。”30岁的东北庄女婿柳得生不会想到,多次在国际国内重要舞台表演且频获大奖的他,竟在东北庄这个古老的村庄找到了“真爱”。

中原地区是中国杂技的主要起源地之一,中原杂技首推河南濮阳,濮阳杂技源自东北庄。东北庄同河北吴桥并称为“中国杂技南北故里”。这里不仅有柳得生的爱人,更为他的杂技生涯点燃了生机。

“来东北庄之前,我曾三次想要放弃杂技。”柳得生说。

上世纪90年代,柳得生为表演前空翻,手臂震断了;第二次是在表演爬杆时,因为一个高难度动作,他直接滑下导致手臂再次震断;2009年,他和自己的师兄一起配合表演,因为强度大出了很多汗,师兄不小心把他甩了出去。“第三次手臂被震断,就想要放弃。感觉杂技太辛苦了。”柳得生说。

因为爱情,柳得生来到东北庄,了解东北庄,现在,他彻底爱上了东北庄。“东北庄杂技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了浓厚的民间色彩。在表演中大量运用了生活工具和劳动工具,富有生活气息,让观众有熟悉感和认同感。”柳得生说。

对柳得生而言,来到东北庄,就来到了杂技的天堂。“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都会玩两手。”——这是东北庄杂技的真实写照。小到一粒豆子、一张纸牌、一方丝帕,大到桌椅或刀剑,都可以拿来作为道具“耍一耍”。

“走遍世界做演出,唯有东北庄让我明白杂技的真谛。”柳得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他说:“不少杂技是三分技术七分艺术”,讲求包装。东北庄杂技注重技术,基本功非常好,一旦强化艺术包装,将具备走向世界的能力。”

如今的东北庄,村里以杂技为主题的文化墙到处都是,杂技小院每天热闹非凡,明清小巷依然有不少孩童在练习,专业杂技学校迎来四海学员……杂技,让古老的东北庄焕发生机和活力,也在改变着这里人民的生活。

和柳得生一样,很多东北庄人都依托杂技走向了致富路。

现在,柳得生已在东北庄及周边招收学员。他说:“我要把自己的技艺本领教给孩子们,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世界各地对杂技艺术的不同期待,使东北庄杂技在未来走向世界。”

2008年,东北庄杂技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在政府引导下,越来越多像柳得生一样的知名杂技艺人回到故乡,把他们的技艺本领教授给下一代。

年近八旬的乔金生是东北庄著名杂技流派“乔家班”的第六代传人,他教过1200余名学生,有68人进了国家各级杂技团。乔金生现在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说:“如果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东北庄表演杂技,并将东北庄杂技传承下去。”

“传统杂技演员从小吃那么大苦、受那么大罪,一个月也就挣两三元,主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杂技表演档次低、规模小,艺术价值体现不出来。”河南省杂技集团董事长付继恩说,现在在东北庄,越来越多的知名杂技艺人归来,在他们的带领下,东北



▲在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东北庄村一个杂技小院,艺人们在表演“飞斧”技艺(11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庄的杂技现在既能在田间地头随手表演,又能在国内外大雅之堂亮相。

东北庄村主任刘忠伟说,几十年来,这个2800余人的村庄为国内外输送杂技精英400余人,足迹遍布全国27个省区以及朝鲜、日本等41个国家和地区,有37人在国内外杂技团

担任团长。

“护花一定要先护泥。”东北庄年近八旬的老支书刘进奎说,“只要找到保护传承的路,东北庄杂技的根就永远不会断;只要坚定创新艺术的决心,古老东北庄杂技就会永葆青春活力。”

奇葩“女德班”,为何有市场?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王莹、赵洪南、冯国栋)“女人就要少说话,多干活,闭好自己的嘴”“女子就应该在最底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网络视频中的这些奇葩言论,来自辽宁省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开设的“女德班”。这个班甚至还让学员徒手擦粪坑,边擦边说“它脏,我的心比它还脏”。

这个打着“国学”幌子的“女德班”是一个怎样的培训机构?“女德班”为何能有其市场?又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抚顺“女德班”被叫停

针对网上传播的“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开办女德班”视频,抚顺市委、市政府12月1日责成市教育局牵头,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3日,抚顺市教育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办学点立即停止办学,尽快遣散包括“女德班”在内的所有学员。

对于这一处罚的依据,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是因为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在审批地点之外的顺城区会元乡马金村私自开班授课,未经教育部门批准,按照一证一址的要求,属无证办学,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二是“女德班”教学内容中存在着悖社会道德风尚的问题。

据了解,涉事的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由抚顺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开办。研究会于2011年4月由抚顺市民政局批准成立,校长康金胜是研究会会长。学校还在全国一些地区设有分校,校长和老师也应邀在全国各地开展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学校课程包括《弟子规》《了凡四训》和女德学习班。

5日,记者来到涉事学校的办公地点。发现这里已经暂时停业,门上贴有“道德讲堂课程暂停,有快件请速唐装坊”字样。在隔壁的唐装坊,营业员说:“道德讲堂已经停课几天了,什么时候恢复不知道。”

而在这所学校第37期“女德中高级班”的招生简章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课程描述:“封闭式教学期间保证全程参加,手机由学校代为保管,不穿高跟鞋,无论课上、课下、寝室、餐厅都不随意闲谈,不化浓妆,不披散头发,不戴金银等首饰……”

“女德班”为何有其市场?

这不是“女德班”第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此前,一些地方“女德班”学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会提及“免学费”“感恩”“自愿反哺”“功受益”这样的关键词。而曝光的授课过程中“现身说法”“下跪忏悔”“亲子拥抱痛哭”的场景,让很多网民不解,为何这种看上去就“很不好”的培训班,还会有人报名?

记者调查发现,“女德班”背后有着一定的市场需求。仅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就在温州、郑州、三亚等地开办有分校。学员有的是被家长送去学习的,有的是丈夫送妻子去学,还有的是被公司送去培训的,也不乏自愿报名学习的。

在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开设的“忏悔改过”栏,贴满了学员的“学习心得”。一位姓李的学员写道:“在2014年我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治疗花了很多钱,最后倾家荡产,病也没看好。……2015年,我遇到了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拯救了我,使我不再输血,自身造血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动了。从接触传统文化不到一个月,我就把药停了。”

专家分析,“女德班”背后折射出的是女性对和谐美好家

庭关系的向往和期盼。一些女性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朋友圈子在变小,倾诉对象在减少。但是,针对女性需求设置的倾诉和学习通道比较少,所以催生了“女德班”等类似培训班。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敬讲表示,“女德班”之所以有市场,也是因为打着“国学”的旗号。实际上,“国学”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倡导的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如果把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视为信条,那只是封建思想的残渣泛起。

“女德班”带来的反思

5日,辽宁省抚顺市委、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抚顺市,办学内容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办学机构仅此一家,下一步将对民办培训机构和学校开展全市排查,加强监管。

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专家建议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在制定准入标准、加强监督监管等方面还大有可为。同时,也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家庭教育、女性教育需求,不能让类似于“女德班”的机构牟利误人。

罗敬讲认为,全社会要更加重视女性在教育 and 沟通交流方面的需求,帮助女性更快适应角色转换,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比如有的高校开设的“淑女班”,作为有意义的尝试,也是教育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辽宁省实验中学教研部主任赵志彦建议,教育部门、妇联、社区、媒体都应该各司其职,开展工作。比如学校开设家长课堂、道德课堂,妇联部门对有需要的女性进行辅导,媒体制作系列传统文化节目等,对公众进行正面引导,提高认知能力,解决自身困惑。

信用变贷款 金融治穷根

(上接1版)

金融“基建”筑起四大体系

“有了服务站,不仅村民贷款很方便,连老人存取款都不用出村。”在兰考县谷营镇霍寨村的金融服务站,记者看到站内不仅有全村的信用档案和自取的金融宣传资料,还有专人服务。管理员王彩告诉记者,今年6月村里设立金融服务站,由一家指定的商业金融机构负责联系,自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上岗,专门帮助村民办理贷款、宣传金融事项。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河南金融扶贫“试验田”里,“信用变贷款”的背后是政府推动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筑起了金融扶贫四大体系,即以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中心(站)为主体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农村信用工程为主要内容的信用评价体系、以风险资金补偿机制为核心的风险防控体系以及承载金融扶贫的产业支撑体系。

四大体系分别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农村金融发展的“网点少、成本高、风险大、没产业”等基础难题。在兰考县普惠金融中心,记者看到,一层大厅人头攒动,来办理业务的群众络绎不绝。据介绍,这个8月底刚投入运营的中心,目前已入驻10家金融机构和7家县直部门,可为群众提供银行、保险、产权交易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目前,卢氏县和兰考县均已实现县乡村三级金融机构全覆盖。兰考县农商行业务经理刘占领说,这让银行客户经理办理业务平均节约1/3的时间,也为银行打开了业务增长新空间,仅今年1至8月份,该行投放的涉农贷款近33亿元。

此外,河南省在金融扶贫中,还要求每个县配套不低于2000万元的风险补偿资金。卢氏县副县长孙会方说,金融扶贫让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农户形成了脱贫合力,实现了金融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今年以来,卢氏县新增新型经营主体658家,总数达到1041家,同比增长2.7倍。

金融成脱贫攻坚“新工具”

据统计,截至9月末,河南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到863.58亿元,较年初新增230.93亿元,同比增速56.37%;扶贫再贷款余额150.3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其中近百亿元为今年投放;122.14亿元创业担保贷款累计支持农民工等约163万人实现自主创业,支持9300多家小企业通过吸纳就业带动脱贫。

目前,河南省正按计划全省推广兰考县和卢氏县的金融扶贫做法。其中,栾川县推广3个月来,截至9月底,9个示范村实现授信全覆盖,402户农户贷款6600多万元,其中贫困户49户。

11月底,国务院扶贫办在河南省召开全国金融扶贫现场会,要求推广学习河南在金融扶贫中的成熟经验。“扶贫要投入,钱从哪里来?”河南省省长陈润川说,河南贫困人口位居全国第三位,但却是个财政穷省,扶贫投入必须集全社会之力,在政府的引导下,金融扶贫大有可为。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建议,允许金融扶贫试验区设立“监管沙箱”,同步探索金融扶贫的监管创新。徐诺金认为,金融扶贫和金融普惠属于金融创新,应该鼓励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容许试错纠错,而借鉴国外做法设立“监管沙箱”则更有助于金融创新。

新华社成都12月5日电(记者李倩薇)

冬日的清晨,成都平原雾色蒙蒙,在一大片清竹林旁,一群十来岁的农村娃娃在乡坝坝里一个现代化的足球场踢球,“传完球跑起来!”一名专业教练在一旁指导。

这是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三河村每周六的少儿足球训练课,村委会从西南石油大学请来教练,为附近的娃娃们免费训练。训练的足球场是成都农村第一座七人制足球场,有较完善的灯光、排水设施,有简易的看台和更衣室。

离这两百米,还有一座约3000平方米、设施完善的天然草坪足球场,在不久前刚刚结束了今年的足球联赛决赛。

“我们今年的联赛赛季长达半年,吸引了周边县市的37支足球队来参赛,总共进行了400余场成人联赛和青少年联赛。”一身运动装扮的三河村足球队左边前卫、“80后”村支部书记谭杰告诉记者,现在三河村作为“成都足球第一村”的名片已经打响了,远至外市的球队都慕名前来“切磋”。

而在四五年前,三河村和足球还沾不上边。当时村子主干道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沟渠破烂,村民收入长期低于全镇平均水平。三河村党支部还在2012年被评为“软弱涣散”党组织,在全镇24个村中评分排名倒数第二,村民们很有怨言。

2013年,在换届选举中,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村人谭杰当选为村支书。新一届村支部从农村环境和综合治理入手,修整道路和沟渠,并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种植柚子、葡萄、无花果等作物。

由于离城区较近,村里的年轻人多,热爱足球运动的人也不少。于是,2013年,三河村成立了农民足球俱乐部,这也是成都市第一个完成正式注册的农民足球俱乐部。俱乐部成立后,大家痛感训练条件不足,于是萌发了自建足球场的念头。

“本来预计花费10万元就能建好,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弄个足球场可没那么简单,排水系统、草坪、灯光及后期费用,全部预算接近50万元。”谭杰说。

对一个村而言,50万元不是一笔小钱,足球场还建不建?这个问题拿到了村民议事会上讨论,最终的结论是继续建,“我们农民不是只有踢坝坝足球的命”。

这时候,足球场在三河村的发展规划中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球场了。通过村集体资金、财政支持、社会资本多方投入,2015年,以村委会为法人代表的三河村天然草坪足球场建好了,2016年,村里又建了第二个塑胶草坪足球场。围绕着足球带来的人气,村里建起了足球餐厅、农产品超市、垂钓场、农家乐、休闲农场,现代民俗,村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不断增长。全村2100名村民人均年收入较4年前增长了6000元,全村吸引的社会资本从4年前的20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1000万元。

现在,在新都区发展文创产业的规划下,村里与位于区内的四川音乐学院合作,引进优秀乐队入驻村里的咖啡馆,并请来团队总体设计“音乐文创村”,希望打造三河村的又一张“名片”。“我们还要建篮球场和网球场,将三河村打造一个集体育休闲、音乐文创、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农业公园或田园综合体。”谭杰说。

足球还给三河村带来了乡风的改变。如今喜爱运动的村民多了,玩牌打麻将的少了,村里很多孩子爱上了足球,通过与西南石油大学的合作,“好苗子”可以送到更好的俱乐部去培养。“村子一天天在发展,大家更有奔头了。”村民王学光说。